

三年来上海金融消费纠纷数量翻番

3 15前夕 法院瞄准金融纠纷案件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王烨捷

10起典型金融纠纷案例中，5个案例中的消费者诉求得到法院支持，3个消费者诉求被驳回。3月14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宋学东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法院应积极通过裁判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依法履职。

这是上海二中院连续第三年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举办金融消费典型案例发布会。该院希望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的当下，为人人都是金融消费者这一社会现象保驾护航。

就在前一天，在聚集了全球各大金融机构的上海浦东，基层法院上海浦东法院发布了《2016年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审判情况》白皮书，其中显示，2016年浦东法院共受理金融消费纠纷26607件，占同期全部金融商事案件的91.47%，同比增长54.59%，接近2014年的两倍，增幅明显。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见识过各种 跑路风波 的金融消费者，维权意识有了显著提高。浦东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该院受理的以金融消费者为原告的案件数比2015年增加了49.14%。

P2P纠纷成维权 热门

2015年，上海二中院大规模开庭审理了一起颇具轰动效应的金融维权案件。当时，包巨芬等61名投资者起诉光大证券内幕交易，并要求民事赔偿（即 光大乌龙指事件 记者注）。

宋学东称此案只是一个开端。如今人们可以直接在App上购买理财产品，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把自己的钱借给陌生人。这些灵活便利的特点，使其中的P2P借贷纠纷频发，成为金融消费维权的热门领域。

某P2P网络借贷平台用户张某，通过某第三方支付公司向素不相识的借款人李某支付了3000元借款。但李某事后未按时归还本息，P2P平台在预先向李某收取了居间费（即中介费 记者注）后，并未催其还款，而是向张某披露了李某的信息，张某将李某诉至法院。不过，李某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出借人的信息，也不认可P2P平台自动在后台生成的借款协议和居间合同。因此，李某完全不承认借款事实的发生。

实际上，这是目前P2P平台较为普遍的漏洞。借款人在借款时，平台并未披露出借人，也未披露借款合同、居间合同，导致发生还款纠纷时产生争议。

无独有偶，在上海浦东法院披露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例中，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一次，中招的是P2P平台。

浦东一家有互联网金融平台经营权的甲公司，2015年时作为中间人，帮助一名借款人从多名出借人处，以15%的年利率、6个月借款期限为标准借到了19万余元。其后，借款人未能偿付利息及本金，甲公司遂向各出借人垫付了相应本息。甲公司后向法院起诉，要求借款人偿还本息。

这是P2P借贷纠纷中最普遍的一种居间服务，即P2P平台既不放款，也不吸收资金，完全以信息中介的形式存在。但在实际操作中，债权是否从出借人处转移到P2P平台，是个较难认定的事实。法院需要审核

相关电子证据，确认平台垫付本息、通知借款人债券转让的事实后，才能作出借款人向P2P平台还钱的判决。

消费者维权有道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在越来越多样的金融消费中，金融消费者的素质也有极大的提升。

上海浦东的一位金融消费者甲某持有被告乙银行发放的借记卡（以下称 涉案账户 ），并开通电子银行、办理 二代U盾。2016年1月8日，甲某通过通过网上银行产生《乙银行自助渠道个人金融资产质押借款合同》，以其名下两份理财产品作为质押向银行贷款146万余元，为期一个月。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笔自助贷款申请，但中国银监会规定，个人贷款采取借款人自主支付方式的条件之一是 借款人无法实现确定具体交易对象且金额不超过30万元。而在本案中，银行直接向甲某自主支付了146万余元款项。

1月8日下午，涉案账户提交自助贷款申请，此后8分钟内，银行方面通过5笔30万元以内的自动放款，共计向甲某发放了146万元贷款。而因甲某不小心泄露了U盾密码，几乎与此同时，其账户分两次向丙某转账153万余元。

次日，甲某向公安机关报案，该案经立案后尚处于侦查阶段。一个月后，甲某贷款到期，但并未按时还款，乙银行遂根据合同约定对甲某名下的该平台账户开始进行外汇保证金交易，杠杆高达1500。这一过程中，陈某与王某通过电子邮件签订了共同投资协议，合伙投资。协议约定陈某

原告甲某认为，乙银行以化整为零的方式规避监管，犯罪分子正是利用这一漏洞将大额款项从其账户中顺利窃取。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48万余元并撤销因本次贷款造成的不良征信记录。

但被告乙银行认为，本案核心问题在于原告的网银密码及U盾失控，其损失的产生并非因银行系统本身问题所致，原告自身泄露密码存在重大过错，故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说法，酌情认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损失30万元，并要求被告撤销原告甲某名下因本案贷款逾期而产生的不良征信记录，若被告能遵守监管部门关于自主支付的规定，设定30万元的单日单次贷款申请上限，那么原告在隔日发现账户异常后及时采取措施，尚不至于产生本案中的超额损失。

国外 飞单 亏钱不担责？

还有的金融消费者，把钱交给国外外汇交易平台公司的中国代理人，血本无归后起诉代理人。这名金融消费者几乎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通过QQ聊天的方式把钱给了别人。

上海二中院提供的案例显示，王某系国外某外汇交易平台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QQ聊天记录显示，王某主动向陈某推荐交易平台，并承诺开户后负责保底并实际操盘交易，随后陈某在国内注册为该国外平台账户会员。

2014年10月9日至10日，陈某投入资金合计约5600美元，同时依规则获取了平台赠金3000美元。其后，陈某的该平台账户开始进行外汇保证金交易，杠杆高达1500。这一过程中，陈某与王某通过电子邮件签订了共同投资协议，合伙投资。协议约定陈某

为共同账户资金出资人，王某负责操盘操作，同时还约定，若合同到期，陈某账户亏损，则王某须支付陈某亏损部分资金。

自2014年10月15日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王某操作下的陈某账户发生了多笔亏损，最终账户结余为4.8美元，而王某还从陈某的账户中累计获得约900美元的佣金。在陈某账户发生亏损后，王某一直声称自己不做代客理财，陈某将钱转给他后，他直接将钱转给了该国外平台。王某认为他与该国外平台的合作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拒绝赔偿陈某的投资损失。

法院认为，境内机构和参与境外机构提供的外汇保证金交易属违法违规行为。陈某在国内注册国外外汇交易平台账户从事外汇保证金交易，不符合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规定，王某与陈某签订的投资协议无效。

由于双方都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一再承诺由其操盘并负责保底，鼓励和引导陈某到该平台进行交易，他不仅没有合理提示交易风险，而且在出现交易亏损时也未按约支付陈某亏损的部分资金，故王某既未尽到合理提示义务，也未履行双方的约定义务。

法院判决，王某在本案存在较大过错，王某应对陈某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陈某人民币19万余元。

法院提示，近年来，类似的业务员 飞单 情况并不鲜见，虽然金融消费者可以通过诉讼维权获得一定赔偿，但大多损失了数额可观的本金，消费者在知悉账户密码的情况下未能及时查询账户情况，监控止损，说明其依法理性交易能力还有待增强。

本报上海3月14日电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 何林璘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府法制办主任王学成遇到了一个困惑。去年年底，他接到了一个面向全国统计监测方案，对辖区经济发展、民主法治、资源环境等5个方面均提出指标性要求。其中，民主法治 有一项 每万人口行政诉讼立案率 的指标，要求小于等于1。

这是一个全国会议上发布的，我们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王学成准备落实这项工作，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如果设置这样的立案率，这里面问题就大了。

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王学成深知，某个地区行政诉讼案件多，说明民众的法治意识强，这也符合中央一直强调的 要把社会矛盾纠纷引入法治轨道解决。2015年之后，国家进一步强调降低案件受理门槛，不要到党委政府门前 闹 了，有矛盾去法院解决，这是好事，可是，当人民群众拿起法律武器诉讼的时候，现在又要求 每万人口行政诉讼立案率，问题就来了。

在王学成看来，政府一旦重视这项指标，可能引起两种反应：要么，一些行政机关可能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去换取起诉者放弃起诉；要么，个别行政机关为了达标，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干预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听到了王学成的话，忍不住评论称，不设定这种指标最科学。

王学成用一系列数据佐证自己的观点：比如，广东省广州市，2015年全年行政诉讼案件2915件，常住人口1350多万，每万人口行政诉讼立案率是2.16；同省经济欠发达的潮州市是22件，常住人口264万，每万人口行政诉讼立案率是0.083。现代化程度高的城市，老百姓诉求就多，诉求多，就通过 法官，到法院去说，好事儿啊。如果法院渠道不畅，民众可能就到党委政府去了。

事实上，被认为不合理的法治指标，也出现在此前一些地方法院的工作报告中。财新传媒2016年曾统计发现，这些指标包括生效裁判文书息率、二审息诉服判率、一审服判息诉率、上诉率等等，而学者认为，当事人享有上诉和申请再审的权利，法院不能也不应干预或限制，对此考核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设置该指标）根本原因在于领导没有认清司法规律，还是在通过行政的手段来管理司法。

在一些实务者看来，部分考核指标是有现实作用的。一名省级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告诉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某些指标可以作为法院对工作整体情况的掌握，就像我们现在不唯GDP，但是GDP这个指标仍然存在。比如，法院发回改判、重审的数量太多，就说明这个地方是不是审判工作存在缺陷、要不要加强力量，倒不一定因为指标结果较低就扣多少分，也不完全是这样。

另一些指标设置确实存在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表示，过去曾经强调 命案必破，一方面，死者家属肯定希望公安机关破案，社会舆论也很愤恨犯罪者，另一方面，命案有时不能做到 必破，有的案件可能因种种复杂因素或基础条件而一时破不了，有些可能三五年才破。

张立勇担心，一旦片面强调命案必破，并给公安部门过分施加压力，有的地方就容易出现冤假错案，司法考核指标一定要科学，这是最根本的。既要有利于促进工作，同时又要科学实际。

王学成也认为，制定有关法治指标，涉及到科学决策问题，若没把决策对象的本质抓准，有可能导致决策不科学，甚至走向决策本意的反面。他建议，比如每万人口行政诉讼立案率的指标，可以考虑换成 行政诉讼败诉率，因为败诉说明政府依法行政水平有待提高、工作作风要改进，并且，有关部门可通过该指标倒逼政府强化法治观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上接1版）代表们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对报告提出的2017年工作安排部署表示赞成。根据代表们的审议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自的报告认真进行了修改。主席团常务主席建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代拟了关于上述报告的2个决议草案。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信春鹰说，到3月11日12时大会规定的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共提出议案514件。其中，有关立法方面的492件，有关监督方面的16件，有关决定事项方面6件。以代表团名义提出的8件，代表联名提出的506件。

信春鹰说，今年代表提出的议案，绝大多数为法律案，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围绕构建发展新体制完善法律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司法体制；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大会秘书处对代表提出的议案逐件进行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没有需要列入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大会秘书处建议，将代表提出的议案分别交由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有关专门委员会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向全国人大代表作出反馈。

大会秘书处就代表议案审议和相关工作提出如下建议：把审议代表议案作为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的重要途径；把审议代表议案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要举措；把审议代表议案作为密切联系代表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方式。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主席团常务主席李建国、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王晨、沈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措、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文、陈竺出席会议。

山西成立少年儿童公益事业促进会

本报讯（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胡志中）山西省少年儿童公益事业促进会3月13日在山西太原成立。

据了解，该促进会是在团山西省委领导下，由山西省少工委、山西省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山西省青少年维权中心等共同发起，山西省从事爱心帮扶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90个会员单位自愿组成的公益慈善性社会团体，旨在关注弱势少年儿童的具体困难与精神文化等多方面需求，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进一步形成少年儿童公益事业合力，更好地帮扶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贫困家庭儿童，做到让捐赠者放心、受助者开心、工作者安心。

会议现场发起了 山西省红领巾爱心守护行动，向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贫困家庭儿童赠送智能学生安全监护服务终端、智慧校园信息化管理平台软件等系列实物与服务，同时向全社会发出 关爱儿童从我做起 的倡议，呼吁社会各界发扬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为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贫困家庭儿童奉献一份爱心。

卡尔·文森号航母 参与韩美联合军演

3月14日，在韩国东部海域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期间，一架F-18战斗机准备在 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上着陆。代号 鸢鹰 的韩美联合军演3月1日开始，规模为历届之最。美国投入 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等美军战略武器参与演习。



龚克代表 科技评价机制改革是高校改革的核心问题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胡春艳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迅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找到了他最关心的207个字，字数不多，但每个字都关乎科技创新的未来。

龚克觉得 特别要点赞的是，短短5句话的表述，把 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 放到了最前面。这非常有必要，我们在这方面差距确实很大。

龚克一直鼓励科技人员冲破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束缚，改革归根结底，还是要激发出人的活力。他主张把人从不合时宜的体制和制度中解放出来，使其迸发出创新的活力，你要科研人员解放思想思想，那么体制机制一定要有突破。

他并不讳言，如今在打通创新成果转化通道时出现一个很明显的的问题，原创成果供给不足，改进型发明太多，甚至 山寨 的太多，长期基础研究的积淀才是成果转化的源头。现在科技工作中急功近利的倾向必须要克服。

为此，科技评价机制改革成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各种改革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因为现有的评价机制中存在种种问题。

都鼓励协同创新，可拿什么来褒奖合作？

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过度使用论文评价。龚克对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首先谈起了 论文标准唯一化 的问题，用论文覆盖了所有科技活动的评价是不合理的。

他说，科技成果转化要解决的问题和在实验室里的完全不同，比如如何实现大规模、高重复率的生产，既保证可靠性、安全性，又减少排放、降低能耗，这些问题都不是以论文为载体的，如果只用论文来评价，那就不利于做这件事。

单就论文评价来说也不尽合理，只认第一作者，没人关心如果没有第三个作者到底能不能成就这篇文章？龚克说，目前并没有建立起如何评价科研工作中合作者的机制，我们总是鼓励大家合作、鼓励协同创新，可拿什么来褒奖这种合作？

都说中国学者缺乏合作精神，龚克认为，不是学者们自私，而是政策出了问题。

与此同时，以学科为单位的评价体系也成为束缚创新的一大因素。龚克谈到，创新往往意味着对既有学科的突破和跨越，意味着新知识甚至新学科的诞生，在 学科思维 的禁锢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可

能会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学科创新的能力。

然而，仅靠一两个学校的改革，很难有所突破。在鼓励跨学科合作的南开大学，去年在学科评估中就遭遇了尴尬。南开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方面有一个影响很大的成果，可谈到成果归属问题时，就要求必须说清楚这个成果到底是属于理论还是应用，最后只好根据第一作者所在学科来划定。

龚克认为，应该承认大家在合作中的付出，不能只说不做，哪怕各50%，如果真要鼓励合作，可以各70%，要体现出合作的贡献大于1。他指出，现在国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并鼓励多个学科的专家教授一起来完成一个大项目，可现在的评价恰恰与政策鼓励的方向相反。

为什么大的成果不太容易出来？这跟评价周期偏短有关。本来3分钟就能开锅，你老揭锅盖看，就不开了。龚克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眼下 对高校科研的评价还是有些急。

他谈到，眼下的 双一流 建设规定评价的周期为5年，对一个大家而言，5年刚培养一届学生，而一个深入的学术培养，5年时间都还看不出什么起色，那么高校自然只能去想5年见成效的办法，你不能

怪基层坐不住冷板凳，因为没人鼓励坐冷板凳。

龚克也表示，关于改革科技评价机制的问题，国家不能说不重视，很多文件中都提到过，但确实没有现成办法。他说，任何一个措施都不会十全十美，建议大家坐下来谈一谈，对当前首先需要破解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形成共识，再去想办法一点点推动解决。

不必过度批评高校高价挖人才的现象

关于眼下出现部分高校为挖人才给出天价年薪的现象，龚克认为，这是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在人才上的一种突出表现，不必过度批评，市场在一定情况下会达到平衡。

他说，目前大家所谓的 天价，一般来说是国内人才的价在国际市场上来说，也就是说，我在美国当教授拿这些钱，你吸引我来，应该不少于这些。这样一来，一下子就大高出国内以往对科研人员开出的价码；甚至出现，你用高薪挖走，我用更高薪把人留下的情况。

政府做宏观调控，也还是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龚克认为，拿了高薪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大家都会有所考量，不可能盲目追高。而这种少数教师打破原有薪酬追高的事件，最终会使得人力资源的总体投入随之提高。

以一所高校为例，如果给高端人才

提高待遇，势必要提高其他全体教师的待遇来缩小差距，特别是提高一些刚入职教师的待遇；而一个学校提高了待遇，也会带动其他学校适当提高。龚克认为，近年来，我国已经大幅提高了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但和世界上一一些人才强国相比，还有差距。他认为，这种趋势将使得人才的地位得以凸显，告别我国过去长期以来见物不见人的问题。

在人才流动的背后，比高薪更重要的是 能否人尽其才 的问题。龚克坦言，南开大学也流失了不少人才，但未必都是被高价挖走的。流出大于流入的现象直到2013年才得以扭转，也是特别揪心。他认为，薪酬绝不是唯一因素，很少见到某个教授在原单位干得很漂亮，团队很和谐，人际关系又特别好，只因为钱离开了。

龚克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高校反思的问题，一些非金钱的因素应该被重视，比如有没有很好的团队配合，能不能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以及文化的认同等。

针对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对西部高校人才手下留情 的呼吁，龚克认为还应该关注 西部高校要尽可能给人才提供更好的平台，对人才的理念、管理服务的效力等都应该有所改变，要不然，即使别人不挖，也很难发挥作用。甚至有人说，我自己辞职过来，即使你不让我来，我也不愿在那儿待下去了。

龚克认为，高校要留住人才，除了政府调控引导之外，关键还是要靠自身改革，不能变成保护落后，成为人才流动的桎梏，这样无论对国家、对高校，还是对人才本身都没有好处。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